

或其他类型描述词,它对信息的“质”划定了空间、时间、范围或类型。

在信息元素理论的基础上,确定分类标准信息所覆盖的领域和范围后,制定出合理的分类体系框架,然后对分类体系中的各基本分类模块信息进一步分类,从而完成对信息元素的定义。分类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困难的、费力的过程,某一特定分类可能需要定义几百个概念。因此,分类标准的制定,需要税务部门、企业和税收理论研究人员的共同参与。

四、结 语

依据纳税报表分类标准生成 XBRL 实例文档后,就可以进入以下层次的应用:一是对企业提交的税务报表进行报表内部的计算验证来保证报表范围内数据的正确性;二是自动将企业的财务数据与税务申报数据进行关联并进行审核,来保证税务数据的真实性;三是提供各种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同一企业的各相关信息综合分析;同一行业的整体数据分析,如对某一单一税种的统计分析等等。XBRL 可以促使企业信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可以适应信息结构的变动,因此其更加适合税务与其他机构进行企业数据交换。

但是要真正实现财务信息供应链的有效整合,实现企业与税务机关的数据交换和税务机关与其他机构之间的数据的有效交换,还需要制定 XBRL 账簿分类标准(XBRL GL)。只有当 XBRL GL 实现并应用后,才能克服不同系统数据整合的困难,连接交易系统、会计系统和呈报系统间的断层,使数据资料交换更便利。因此 XBRL 的研发和应用任重道远,需要财务信息供应链上各环节的通力合作。

参考文献

- (1) JONES, A. & WILLIS, M., 2003, The Challenge of XBRL: Business Reporting for the Investor, *Strategic Finance*, 11(3).
- (2) Coffin, Z., 2001, The Top Ten Effects of XBRL: the Future of Internet Reporting.
- (3) 高锦萍、张天西《XBRL 财务报告分类标准评价——基于 XBRL 报告分类与公司偏好的报告实务间匹配性研究》,《会计研究》2006 年第 11 期。
- (4) 张天西等《网络财务报告——论 XBRL 的理论框架及技术》,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作者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财会中心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向东)

浅议唐朝中后期的

内容提要:发生于唐朝中后期的钱荒是我国古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由于流通中金属货币不足而导致的货币危机,其发生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均田制的破坏、两税法改革等事件密切相关,是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本文从唐中后期的经济背景出发,对钱荒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中晚唐 钱荒 两税法
铜钱 商品经济

钱荒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发展过程中,因流通中的金属货币相对不足而引起的一种货币危机现象。我国货币流通史上的第一次钱荒形成于唐代贞元年间,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帝,持续了五十几年。唐朝时尚未出现“钱荒”这样明确的称谓,而是用“钱重物轻”来形容这种货币危机现象。“钱荒”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宋代欧阳修在庆历三年(1043)的上书中提到的“淮甸近岁号为钱荒”。宋朝人用“钱荒”二字说明了“钱重物轻”的内涵:“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一、钱荒发生的经济背景

(一) 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南迁,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北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促进了南方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安史之乱平定后,北方经济渐渐得到恢复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唐朝都市中的商业活动逐渐突破了过去的坊市界限,商人可在坊内开设铺肆。除了普通商店,还出现了杂货铺、柜坊等。其中,柜坊是专门代客户保管钱财业务的机构,此类金融机构的产生,表

《全宋文》(第十六册)卷680。

《宋史》卷180《食货下二·钱币》。

钱荒

法文宗

明当时的商业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商业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对货币需求也显著增加,货币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当时的理财家刘晏曾言“如见钱流地上”,足见货币经济之发展。

(二) 均田制破坏,土地兼并严重

唐朝前期,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远超前朝。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扩大贫富差距,加剧土地兼并。加之农民因赋税、自然灾害等原因不得不出卖土地以维持生计,均田制不断遭受破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唐玄宗时期达到高潮,“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面对大土地所有者的疯狂进攻,政府对兼并者的既得利益多方照顾,放宽贵族官僚占田的最高限额;“更从宽典,务使弘通”,完全废弛了土地买卖的限制,均田制调节、管理和控制土地关系的基本职能由之丧失。正如欧阳修所说“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均田制就此崩坏。

(三) 两税法的施行

均田制遭到破坏后,大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租庸调制难以维系。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十三载,天下人口数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千八百八十八,课税人数仅占七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通典》卷七也记载:“天宝十四载,全国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课征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合两者观之,课征人数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租庸调制形同虚设,财政入不敷出。为改变这种状况,唐代宗时开始改革赋税制。到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由征实物改征钱币,将原来租的部分大部并入地税中,征收米粟稻麦等实物,庸调部分大部并入户税中,征收铜钱,同时对附于地税的青苗钱及盐、茶、酒、商税也征纳现钱;在征收对象上则规定:“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各阶层的人都要或多或少交纳一定的现钱,政府的现钱收入由此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二、钱荒的显现

两税法改革和以钱定税实施后,对货币经济和货币流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显著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农民生产的布帛等物更多地进入流通之中,国家的各种支出及民间对货币需求增多了。

但从货币供给方面来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并未因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而增加。玄宗天宝时每年的铸钱总数约为327 000缗,到宪宗时(公元806~820年)全国铸钱额只有135 000缗。两税法的实施更加使得货币大量回笼,货币供给紧缩的现象日益严重,钱重物轻的情形便显示出来:“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初定两税时,绢一匹价格为三千二三百文,而贞元十年(公元796年)每匹绢则已下跌到一千五六百文”,宪宗时“四十年前初定两税时,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四十年后,则绢一匹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以两税法的实施为起点,通货紧缩日益加剧,流通中的货币不足日益严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钱荒产生。

三、钱荒发生的原因

从货币均衡和市场均衡的角度来看,市场需求以货币为载体,市场供给要靠货币需求使之实现。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和贸易的迅速发展,市场供给增多,要求有更多的货币使之出清,但货币供给并未满足货币需求的增长,导致短缺的货币追逐超额的商品供给,钱荒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究其发生的具体原因,主要有:

(一) 两税法计钱纳税

两税法实行后,收缴铜钱,不纳实物,“建中初,杨炎为相,乃制定两税法,一切税收,全用铜钱”。同时,征税范围涉及社会各阶层,实行两税法后,“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为换取货币缴纳税赋,农民将生产的布帛谷米投入市场从而促进了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但由于大量的货币作为赋税被政府征收,法行当年,征钱数达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是天宝时二百余万贯的近十倍。这部分铜钱作为国库之资被囤积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通货紧缩表现为钱重物轻,并成为民间蓄钱、销钱之风的发端。

(二) 民间蓄钱、销钱严重

两税法施行后以钱定税,造成货币回笼,通货的

币值升高,物价下跌,“故藏钱者得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之资”。面对钱重物轻的状况,居货者竞相抛出货物以贮藏钱币,遂造成流通手段与贮藏手段之间的矛盾。据记载,当时“见钱渐少,皆缘所在蜜塞,不得流通”。王公贵族、方镇将帅、富商豪门纷纷窖藏钱币,规模巨大。许多权贵军阀在京师蓄钱,少者也往往在50万贯以上,“时(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京师里间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锬、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这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更加缺乏。

同时,唐朝中后期民间生活用铜大量增加,“销钱为器”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铜贵,铸钱往往不敷成本,如江淮钱监铸钱,每贯钱成本达二千钱,铜钱的名义价值远低于实际价值。又因铜器缺乏,供不应求,铸铜为器便可从中获利,如德中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江淮一带,“铜千钱为铜六斤,铸器则斤得钱六百,故销钱者多而钱益耗”。

民间蓄钱、销钱之风,反映了铜币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之间的矛盾,是兼有商品和货币双重属性的铜钱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所导致的,致使流通中的铜钱更为紧缺。

(三) 佛教用铜量大

唐朝佛教盛行,铸佛像、法物和寺院建筑用铜数量极多,也是造成币材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亚洲的佛教传播中心从印度转移至中国,国内佛寺林立。据记载,唐会昌五年全国佛寺有四千六百,大量铜材被用来制造佛教用具。唐代宗时,“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妥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宝历中“宫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铜镜三千片”,足以说明佛教用铜数量之巨。

由于铜料紧张,众多寺院甚至销毁铜钱铸造佛器。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大和三年,“诏佛像……唯鉴、磬、钉、怀、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死”。通过禁销禁铸法令,可从反面窥知销铸盗铸成风。直至武宗灭佛以后,收铜像法器用来铸造铜钱,竟可供应全国的货币流通缓和钱荒,足见佛寺用铜大量占用了铜铸币的材料来源。

(四) 铜矿开采量不足

铜作为铸币的直接材料,其产量大小直接影响铸

币时代的货币供给。唐代中叶,由于旧有采铜矿进入开采稳定期,富矿减少,增加铜钱来源变得日益困难,加之中晚唐战乱不断,也给铜的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到元和初年(公元806年),“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按开元钱“积十钱重一两,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的铸造标准,即便全部用于铸钱,也仅铸五万余贯。另据《新唐书·食货志》的资料计算,综合元和初年与文宗、显宗时铜的年产量才九十万斤左右,即使全部用于铸钱,也仅有二十一万贯,远不能满足流通对铜钱的需求。

(五) 商品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唐中后期,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在中外贸易中,外商多带来香料、药材、宝玉、琥珀、象牙、犀角等,并从中国带走瓷器、丝织品、铜器等。双方贸易中,实物交换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为现钱交易。

由于外商不断向中国输入货价较高的奢侈品,中国处于逆差状态,铜钱外流便成为弥补差额的主要手段。据1930年对日本境内48个地方出土的铜钱所作的调查显示,唐代铜钱有47229枚;公元10世纪初也曾在尸罗夫(Siraf)发现铸着汉字的铜钱以及中国输出至海外的铜器,这都说明唐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铜钱和铜的外流,客观上也导致国内流通中货币量的减少。

综上所述,唐朝中后期的钱荒其产生和发展都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归根到底,在于以实物形态存在的金属货币供给难以满足因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而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解决商品交换扩大和铜钱供给不足的矛盾,仅靠铸造更多的铜钱是不够的,钱荒问题的解决,还在于应创造出新的货币形式以从根本上解决货币供给不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2)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3) 朱大渭、张泽咸《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齐鲁书社、天津出版社1993年版。
- (4) 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 (5) 邱崇明《论中晚唐的钱荒》,《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责任编辑:王 敏)